

風雨絃歌

黃麗松回憶錄

童元方 譯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0

ISBN 962 209 519 4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聯志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 | |
|---------------------|-----|
| 序 | vii |
| 1. 早年歲月：父親與民生書院 | 1 |
| 2. 大學時代與香港圍城 | 13 |
| 3. 奔向大後方：在三江與桂林的日子 | 21 |
| 4. 戰時陪都：重慶 | 35 |
| 5. 經印度赴英國：在牛津大學做研究生 | 43 |
| 6. 在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後研究 | 55 |
| 7. 新加坡：艱難的事業之始 | 65 |
| 8. 一所華文大學的創立 | 75 |
| 9. 新國家的新大學 | 83 |
| 10. 獨一無二的南洋大學 | 99 |
| 11. 回到母校 | 111 |
| 12. 退休後的生活 | 131 |

附錄

| | |
|---------|-----|
| 附錄一 | 147 |
| 附錄二 | 151 |
| 附錄三 | 157 |
| 附錄四 | 163 |
| 譯後記 童元方 | 169 |

第一章

早年歲月：父親與民生書院

不論黃氏族譜所記載的成就是多麼輝煌，黃家近世幾代卻是出自汕頭西邊揭陽縣的一貧寒農家。汕頭市是華南沿海的一個海港，大約位於香港以北一百多哩之處。我的祖父黃壽亭少年時遭逢不幸，使他遠走他鄉，但卻因此而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具體說來，是有一次，他在田裏工作時右腳受到了嚴重的割傷，草藥沒有療效，傷口迅速化膿，竟至於不可收拾。他在田裏再也無法工作了；而大家庭裏的眾人卻視他為不事生產、只吃閒飯者，他就越來越遭人看不起。這個少年人於是決定離家到附近的汕頭市去求醫。最後到了汕頭的福音醫院，而為該醫院所收容。

於是腳傷所帶來的不幸倒成了他生命中的轉捩點：發炎的腳雖然要花好幾個星期才能消炎，他卻並未偷閒，而是在醫院的廚房幫忙工作。只要有需要，他就快樂地服務。他也每日參加醫院裏為病人而舉行的禮拜。等到他腳傷痊癒時，已成了醫院大家庭中極受歡迎的一員。不久以後他就受了洗，聽從教會的鼓勵勤讀神學，最後受封為牧師。他的整個一生都是在汕頭工作，一直到退休後我父親請他到香港民生書院與我們同住後為止。那大約是一九三六年，也是我在中學的最後一年。他講道時我經常與他一起去教會，去福音堂，這樣我逐漸了解他。因為他只會用汕頭方言講道，他所講的一

定要譯成廣府話，香港的會眾才聽得懂。我於是就成了現成的翻譯了。抗戰時我到了大後方，從那裏又去了英國，之後再去美國。一九五零年末，我終於回到遠東來，取道香港赴新加坡，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的祖父。那年他八十九歲，不久就去世了。

我的父親名黃映然，也像我祖父似的，他的一生亦肇始於不幸。在經過多年漫長的艱難困苦之後，才見好景。父親幼時祖母即過世，祖父再婚所娶的繼祖母性悍而自私，所以父親每天的生活均極悲慘。比如必須每日早起為全家到井中汲水，放學後要在廚房裏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做家務時還須經常把繼母所生的小弟或小妹負於背上。而每日以肩挑水造成了右肩變形，變形的嚴重情況就是從相片中也看得出來。如果繼祖母不開心了，父親就會遭到毒打。他所受的直如奴隸，已無絲毫長子應有的待遇。可是，也像我祖父似的，他的這種不幸其實是隱而未顯的福祉。以下奇遇竟而發生：當我父親十多歲時，祖父所屬的教會，來了一位新的傳教士哈克尼斯小姐 (Miss M. Harkness)。她實際上頗有資財，傳教是義務工作。她非常喜歡我父親，父親在家中所遭受的一切她看不下去，同情之餘，就向我祖父提出送我父親到香港讀書的建議，所有開銷全由她負擔。我祖父聽了自然是異常高興，立即接受了。如此，我父親十八歲時即逕赴香港，就讀於著名的教會學校聖士提反書院了。對於我父親而言，新生活於焉開始。

我父親在聖士提反書院時非常用功，藉以彌補一些過去荒失了的歲月。經過幾次跳班升級，他在大約三年多的時間裏完成了五年的課業。所以在最後一年，學期還沒有結束，他就參加了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入學考試，而且獲取錄。那是一九一二年，他已經二十一歲。哈克尼斯小姐對他的進步十分滿意，也就繼續在經濟上予以支持。我父親在聖約翰大學所習為電機工程，一九一六年卒業。他成

為中國極富盛名的大學的畢業生了。那時能在大學畢業，是罕見而可貴的，社會視之為菁英，因當時大學教育之創建，只不過短短數十年而已。

他在聖約翰大學的當日情況如何？由他告訴過我的兩個故事，可見一斑。他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上海傷寒流行，情況非常嚴重。他和其他許多同學都傳染上了。醫生已宣布沒有治癒的希望，跟他同屬一類沒有希望治癒的同學，還有三位。大家躺在醫院同一間病房裏等着大限來臨。不久有兩位同學真的死了。我祖父從汕頭坐船到上海，路上走了四、五天，來見他兒子的最後一面。可是，此時卻好像發生了奇蹟，父親康復了。他告訴我就是那一次他決定了：既然他的生命是揀回來的，他要轉而奉獻給仁慈的造物主。

我父親給我講的另一個故事是：他在聽了自己的物理老師渥克教授 (Professor Walker) 演奏過小提琴之後，決心去學拉小提琴。於是找來一把，更幸運的是教授願意免費教他。他畢業以後回到汕頭，繼續把玩。他時常以拉小提琴來哄我的當時還是嬰兒的哥哥麗文。而麗文聽到父親為他奏起的曲子，就立時不哭了。父親在一九二三年離汕頭攜眷到香港時並沒有把小提琴帶來，大概十年以後，我表哥吳敦仁，也是我一位姑姑之子，向我父親表達了他想學小提琴的興趣，我父親自然把留在汕頭的琴送給他了。他一直很仔細保養這琴，可是在一次颶風時，他家淹水，遭到了很大的損害，小提琴也斷裂成好幾截，可以說散掉了。表哥勉力將琴又湊回原狀，雖是相當外行的業餘作法，但卻做得一點不差。表哥又繼續拉起琴來。我父親一九九一年去世後不久，我與哥哥忽然收到了表哥的一封信，此時表哥已是退休了的醫生。他告訴我們這把小提琴還在他那裏，他要還給我們。我們很高興地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我為了汕頭大學的公事到汕頭去的時候，順道拜訪了我的表兄。在一個簡單

的儀式之中，從他手裏接過了這把並非出自名廠的廉價小提琴。琴身的木料和裝飾都不過是極尋常的種類，雖然奏出的音調還聽得過去。當然這些都屬意料之中，因為我父親當年絕對不是一個經濟寬裕的學生：這琴的價值絕不會如何貴重，但琴的意義對我們而言卻是多麼重大。

我父親對音樂的興趣，我哥哥麗文、妹妹麗瑛，還有我自己，他的子女三人都受了薰染，或可說遺傳到了。麗瑛小時候就學鋼琴了，她以優異的成績通過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所設鋼琴考試的第六級時，父親獎以一架摩利臣(Morrison)鋼琴，那是香港當時可以買到的最好的牌子，價錢在五百港幣以上，超過我父親月薪的三倍。麗文十二歲時學拉小提琴；兩年後接着是我，麗文是我的啟蒙老師。家裏經常有音樂演奏，我清楚記得：有一天父親帶了樂譜回來，是兩把小提琴、一架鋼琴的三重奏，是從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改編而來的。他要我們合奏給他聽。

於此，回溯一下我父親在汕頭的生活。他從上海回來就任汕頭港口對岸、礮石教會所創立的礮石中學的副校長之職。一九二零年他獲一機會去美國深造。我母親雖已懷孕，正期盼着我的來臨，卻仍鼓勵他去。他到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師範學院，在教育碩士課程註了冊。不巧的是他發現自己對一些必修科目沒有什麼興趣，遂離開了紐約到芝加哥去。在那裏他得到阿爾爾學院(Armour Institute)，也就是伊利諾理工學院的前身(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入學許可，回到電機工程他的本行，最後得到了畢業文憑。這期間他以出售由汕頭運來的繡花麻織品來維持生計。所掙的錢，不僅足以維持他在芝加哥的學業，而且足以支撐他在汕頭的家。後來他由美國回到中國，受聘為原來礮石中學的校長。

我父親帶着全家遷居香港是在一九二三年，受僱於他的母校聖

士提反書院，做數理教師。不久以後，他又被聘為一所新學校的校長。這所新學校即為民生書院，就要在九龍城的新發展區創立了。這一區包括九條短街，位於獅子山下，俯瞰九龍灣，在香港唯一的機場附近，好像是給拖到九龍的一角似的。一九二六年學校第一次招生，我在小學部註冊，成了最早入學的小學生之一。我在那裏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念到一九三七年高中三年級畢業為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軍進佔東三省；翌年發動一二八事變，又入侵上海。有一段時間，十九路軍曾經英勇地抵擋日本軍隊，儘管在軍人數目上，軍事裝備上，十九路軍都不及日軍。十九路軍中有一位高級軍官翁照垣將軍，他是法國留學生，汕頭人，也是我父親的朋友；他的兒子是我民生書院的同學。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號，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大舉侵華，哥哥與我正預備離家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去就讀。事實上，我們已整裝待發，訂了「加拿大皇后號」七月二十八日的船票赴滬。而戰爭已由北方蔓延到上海，範圍越來越大，八月十三號滬戰爆發，全面的戰爭之火終於吞噬了整個中國。我們除了留在香港、靜待發展以外，別無選擇。第二年我僥倖以優異的入學考試成績得到了獎學金而進入香港大學。

我父親所創立的這間學校在許多方面均很特出：這學校是基督教學校，可是與任何教會或傳教團體都沒有關係；學校非常強調學生的道德教育與靈性發展，同時重視培養學生對母校的團體精神。學校為學生準備中學會考，還有進入港大的入學試。港大收生的標準是力求英文應用的能力，但是民生書院在逐量增加英文之前，更要求先為母語的掌握打下基礎。在所有的官立學校和政府津貼學校（包括大多數的教會學校）都以英文為第一語言，中文為第二語言（實際上很差的第二語言）的時代，民生書院卻已開始教小學生文

言文，再接着教授白話文，然後逐漸增加英文的份量，並且增加用英文教學的科目，直到最後幾年學生對中英兩種語文都很嫻熟為止。因此，民生書院的畢業生不但可以進香港大學，而且可以進大陸的有名大學，如燕京、聖約翰，和嶺南等大學。除了重視母語以外，書院也花足夠的時間教中國的歷史、地理，並且讓我們知道大陸上發生的事情。如此，我們雖然在殖民地長大，但對我們自己的文化遺產卻感到光榮，對故國的情況也相當明瞭。

民生書院的另一個特點是教國語，我父親堅持我們每個學生都要學。雖然國語是中國的法定語言，但在當時的殖民地卻幾乎沒有人講。除了一些科目是由說國語的老師教的以外，我們把每個星期六早晨的最後一兩個鐘頭花在用國語作公開演講上，學校規定我們輪流參加比賽。這不僅給了我們講國語的機會，而且增加了我們公開演講的經驗。

民生書院之強調中文教學是付出了相當的代價的。民生創校始於一筆不大不小的捐款，兩位捐贈者區澤民與莫幹生各出一萬元（此為民生書院一名的由來），學校開學以後不久也就所餘無幾。學校如要繼續辦下去，同時維持相當的水準，經濟支持的來源自屬最重要的事，而學校除了政府的資源，也沒有其他的地方可求。然而，當時香港教育署卻認為民生書院在語文教學方面犯了津貼學校的規，因而不得申請津貼；但在這一點上，民生又絕不妥協。這時學校的資源就快要用盡了。這是學校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後來學校的董事們因為怕被拉去分擔財務的重負，甚至不來參加校董會。在一次這樣的會上，只有主席曹善允和我父親二人出席，主席居然向我父親提出關閉學校的建議。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他在會議中輟以後從城裏返家，向我母親說出這個令人沮喪消息時的音容。

幾年來，教育署除了派視學官來以外，實際上從來沒有把民生

書院當作一回事。只派一位布朗先生(Mr Brown)，每年來校訪問一次，然後寫報告。我還記得初中一年級時曾在一次這樣的場合上見過布朗先生。他是一位非常高大，又相當肥胖的男子，有一張紅臉。我父親把他帶進我們的教室，高高在上的視學官很快坐下來面對着我們，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他似乎很輕鬆，很自信，只待了一會兒就飄然而去了。在他告訴我父親的事情當中，最重要的是：學校花了太多時間在中文的教學上。他也很可能在報告書中嚴厲指責這一點。

布朗先生以這樣的姿態來了好幾年，每一次一個多小時隨便的訪問之後，交上一份大致相同的報告書。時間就如此緩慢地拖過去了。學校對政府資金的需要卻更加急切起來，我父親就逕自去見教育司，要求教育署對學校作一深度的調查，而且他相當大膽地請求教育署派遣其他人，而不是布朗先生來負責這個調查工作。教育司很認真地看待這個請求，換了官立學校中最知名的皇仁書院的校長韓迪塞德先生(Mr Handyside)擔任這項調查的工作。韓迪塞德的調查花了三個早上，最後他向教育司呈上報告書，列出學校的各種特質，並建議：民生書院雖不能給予一般的年度撥款，但應得一特殊的撥款。教育司接納了這個報告書，通過了一年六千港幣的撥款，這在當時是相當大的一筆款項。自此以後，民生書院在政府津貼的學校中佔了一個特殊的地位，這個特殊地位在教育署致全港各學校之正式函件中的稱謂上反映了出來：「致所有的官立學校、津貼學校以及民生書院。」

大約在這個時候，有兩位曾深深影響過我父親一生的人訪問了學校，一位是曾資助我父親念書的哈克尼斯小姐；一位是聖約翰大學的校長波特博士(Dr Pott)。哈克尼斯小姐很高興看到她對一個不幸的青年的善行竟達致如此成果，認為這是她一生所做的事中最足

驕傲者。波特博士也與她同樣的開心，我聽到他對我父親說：「映然，我以你為榮。」此後所有民生書院的畢業生皆獲准保送聖約翰大學。

在那些關鍵的年月中，一直站在我父親身邊，與他同甘共苦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劉似蘭女士。她生於汕頭另一教會的牧師之家，受教於廈門教會所辦的師範學院。身為善良而又富同情心的校長之妻，她也是教師之友，學生之母；尤其是對為數不少、主要來自汕頭的寄宿生而言。一九三六年尾我母親在四十歲的盛年卻忽然撒手塵寰，對我們全校及全家都是至為悲痛的一擊。一九三八年我父親續娶了一位在民生小學任教的呂仁圃女士，她後來生了四個兒子：麗東、麗麟、麗雄以及麗榮。

父親因為長期任校長一職，我也就在同一間學校裏完成由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教育。在那十二年中我有幸受教於許多有愛心、肯奉獻的老師，他們的影像直到今天仍不時在我的記憶當中浮現。

在這些老師當中有儒生，他們在清廷舉辦的科舉制度下，有中秀才、舉人的；還有拔為貢生的。他們教我們經書，如《論語》等；也教我們用文言作文，把我們每星期所作的文章加以修改，從不間斷。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在學校的最後一年，可以於兩小時內，作出一篇三百字左右的文章，而且用毛筆謄寫得端端正正。

教我們英文的老師，由小學一年級學字母時開始，就是英國本地人。這些英文老師中樂克太太(Mrs Anne Luck)與蒲樂道先生(Mr John Blofeld)我記得特別清楚。蒲樂道先生在我離校之後，成了我終身的好友。教我們國語和歷史的老師多是內地大學畢業，其中包括閩人俊和楊士端二位。我還要特別提一位傑出的數理老師——港大出身的麥啟鴻先生，我在一九七二年回到港大服務時與他的女兒曜

芬不期而遇，發現她在醫學院的圖書館當主任。多少年過去了，卻如見故人，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高興。

儒者老師自成一個特殊的階級。他們的為人既有尊嚴，行事又重禮節；隨口而出的是夫子的教訓，經常引用的是古典的經書。談話中襯以自創的文言句子而顯得學識博瞻，徐急有度的聲音尤令人感到悅耳。有一位老師性好飲酒，他經常是在中飯以後來上課，有些微醉中的痴顛。於是他興之所至，搖頭晃腦地對起對子來；或帶頭吟唱起經書中的佳句，我們就歡天喜地應聲而和。有一次，我們唱得太熱烈了，竟引來我那位做校長的父親匆忙趕至，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父親對這些博學的長者總是禮遇有加而優容備至的。因為這樣的人在三十年代，畢竟是不多見了。因為科舉考試在那以前許久，也就是一九零五年，即已廢除。

可以這樣說，我們這些學者老師幾乎是以宗教的尊敬來看待《四書五經》。當然，「孔孟之道」在他們的生活中份量很重。一千多年以來，科舉考試下的所有士子，不論出身如何寒微，只要科考表現傑出，就有機會進階朝廷，身居要職，而其中竟有些確實達致「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地位。這裏所謂的「一人」自然是皇帝了。所以，士子十年寒窗的最終目的就是達此成就以光宗耀祖，同時輝煌的終身事業於焉展開。

《論語》的內容是既崇高又平易，語言是既簡淨又雍容的，而一詞一句，也往往不止一義。比如有一句只有八個字：「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這句話在《朱熹集解》中，是用了三百多個字來釋義的。而我們的老師則用了整整四十五分鐘一節課的時間來說明。

雖然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在誦讀經書、學作文言及練習書法，但現在回顧起來，並不覺得浪費。事實上，如果今天還能選擇，我大概仍要選這樣的教育方式。

經典的學習有時也很有趣。我們的老師以至高的尊崇看待聖人的教訓，我們卻不覺得有那麼嚴重。在我們所生長的那個年代中，新起的現代學者對說孔子言行的《論語》往往作不同的解釋，有時他們甚至自比大師，而故作驚人之語。如在這些學者的刊物當中，就有一本雜誌也叫做《論語》，與孔子的《論語》，竟完全同名。而這一雜誌的作風就特別愛批評孔子，有時甚至會嘲笑起他的教訓。比如，《論語》裏有一章記載孔子去見當時的美人南子，而引起了弟子子路的不滿，使得孔子非解釋他去看南子的理由不可，甚至發誓說自己所做並沒有不恰當；如果有，他寧願受上天的譴責。原文是這樣的：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而現代的《論語》雜誌解釋這一段時，說聖人也有喜歡異性的弱點，聖人費事去發誓只是表現自己對與南子相見一事有些羞慚。此外，《論語》還載有孔子另一弟子宰予因晝寢而遭夫子責罵的事。因為我自己不時也有午睡習慣，我猜我大概沒有什麼資格做儒生了。

《論語》中也紀錄了一些孔夫子的生活習慣，使我們讀來更有興味。「夫子食不徹薑」，難怪中國的烹調裏一直到如今都離不開薑。「食不言，寢不語」，「切不正不食」，我們當時就想，孔子的生活固然仔細，但是也未免過於挑剔了罷！

在我所有的老師中對我的一生影響最深的是蒲樂道先生。他其實只比我大七歲。他從劍橋一畢業就到東方來冒險，看他夢中的中國。最後，落腳在民生書院當教師。我有機會能認識他這個人，實甚幸運，遂視他為啟蒙老師。我們後來成為要好的朋友。自從在民生書院相別以後，戰時在桂林、在重慶；戰後在英國、馬來亞和香

港，多年來我們都能經常相見；還有在曼谷，那是他人人生經歷最後三十年的地方，我們也相聚了不少次。

民生書院成立早期的八、九年間，是以租啟德濱與啟仁道的大樓為校舍，還有一個大操場與大樓相連。後來學生人數增加，我父親便計劃為學校另覓校地。為達到這個目的，籌款的運動組織起來，而全校師生都熱烈地響應。我當時在高中一年級的班上，大約有二十個同學罷，舉辦了一場音樂會，會中最後一個節目是一齣短劇，劇名是「好兒子」，我也參與了演出。幾個月的心力花在這音樂會上，結果籌到了八十三元。金錢上的報償不大，但為了團結起來支持母校，為了發揚民生書院著名的團體精神，所做的奔波與努力，當時是興奮無已，至今回憶起來，猶感心意怡然。

九龍城寨對面、嘉林邊道的一大塊農地學校買下後，向政府要求將農地改成建築用地的申請也通過了。不久以後，第一座大樓蓋成了，兩翼共有十二間教室，中間分別是禮堂與辦公室。也有很多土地供運動之用，而運動本來就是民生所一向鼓勵的，直到今天民生書院依然可以自詡為香港少有的幾間運動設施俱全的學校之一。

如此，我父親在校長之位服務了十四年以後，於一九四零年離職時，民生書院已是香港先進的學校之一，且有它自己別樹一幟的風格。隨着學校的成長，民生書院的校友們在數目上增加了，各人在社會上的成就，把母校的聲譽提得更高了。他們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活躍團結的；對母校都是忠誠不貳，支持到底的。他們對母校的諸多貢獻，成了我父親晚年驕傲與滿足的主要泉源。

第二章

大學時代與香港圍城

雖說香港大學是在一九一一年成立的，其源頭卻可溯至一八八一年所創的香港西醫書院。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即為書院的第一期畢業生。香港大學的創始者是當時的港督盧押勳爵 (Lord Lugard)，他對這個學校的成立頗具遠見；即是認為香港大學應為中國服務，參與中國的青年教育，作東西文化的匯通之所。但是香港大學建校以後幾十年，創辦人的理想可以說幾乎完全沒有實現：港大與其在大陸上同時代的姊妹學校彼此既沒有什麼來往，也沒有什麼內地的學生到港大讀書。

導致這種情況，可能有兩種原因：港大的教授、講師幾乎清一色是英國人；以我所知，其中對中國有興趣的極少。而教學的語言又是英文，所收學生僅限於能在香港通過英文入學考試者。所以內地生很難有考取的希望。其次，在港大讀書非常昂貴，因為學費既高，住校的食宿開銷亦很可觀。因此大部分的學生是來自香港的富家子弟，而大學實際上可以視之為有錢人的菁英培養機構。可是，另外卻有一些獎學金的名額，主要由香港政府提供，根據入學考試的成績而頒發，使一些非富家子弟亦有機會進港大就讀，我就屬於這一類。

因為一九三七年中日爆發了戰爭，我無法去上海的聖約翰大學

讀書，翌年我參加了北平的燕京大學在香港舉行的入學考試，十二個考生中錄取了四位，其中也有我。可是香港大學的政府獎學金是全額的，足以資付所有的學雜費及生活費，對此全面照顧的待遇，實在是難以拒絕。何況，燕京大學既離家甚遠，又在日本軍隊接收的陰影之下，所以我就決定念港大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進入香港大學以後，我發現自己在同學之間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以我的教育背景而言，這並不令人奇怪，但是我很快就適應了。我很高興遇到幾位同學，他們因為與我有類似的背景，也就有類似的看法。其中相處特別投契的有余叔韶與劉殿爵，我們自然成了要好的朋友。叔韶後來在香港當了律師，甚有名望；而殿爵則成了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講座教授。

最初我是屬於文學院的學生，但主修理科組的課。不久，就轉到新成立的理學院了。大學的課程第一、第二年有五門科目，第三年有三門，最後一年是兩門。最初的兩年英文是必修科，我們與文科生一起聽講，一起上導修課。我認為對理科生而言，讀英國語言與文學絕不是浪費時間。聽講莎士比亞、密爾頓、蕭伯納與謝里丹等等，既有興味，又令人振奮；且與其他的課比起來，是一種調劑，是大家所歡迎的。此外，文學院有那些漂亮的女同學，而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的學生卻幾乎全部是男的。來自男校的我，有機會認識這些女同學，是一嶄新的體驗，令人鼓舞，當然同時也令人分神。

我們在港大的第一年有一些浪費時間，因為所教授的大部分是重複曾經學過的。這對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有相當壞的影響。他們的大學生涯因為在一開始即感輕鬆，所以參與了大量的課外活動，學業也就一落而至考試不及格的地步。我班上第一年有十個學生，第二年縮減至七個，第三年三個，而最後一年只剩下林蓉娣與我兩

人。不過，我們並沒有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原因是：當香港在一九四一年尾陷落於日本軍人手中時，我們距畢業考試大概還有四個月，所以我們沒有得到正式學位，而是獲頒「戰時學位」。這些正發生在我也開始輕鬆過日子的時候，如果不是戰爭的突然來臨，我可能也考不過畢業試，那也就永遠做不成港大的畢業生了！

我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師，是當時的理學院院長、數學教授的布朗先生(Walter Brown)。他花費了很多心血教書，而上課並不看筆記。他所講授應用數學的課，對我真是多所啟發。教我們純數學的費德太太(Mrs Jean Faid)，是一認真的老師，我們都非常喜歡她與她所講的課。化學教授拜爾先生(Professor G. T. Byrne)是一位父親般的人物，但是他講課的內容主要是在黑板上寫下一行行的反應式，這些我們也一行行照抄進筆記本裏。可是，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對做研究有興趣的老師。至於其他大部分給我們講過課的老師，也許就說不上對學生有什麼可以稱為啟發的了。有一些只是念筆記，而有些筆記又是陳年老貨，多屬跟不上時代的教材。

布朗教授是少數對學生有興趣的老師。三年級那年學期結束時他要林蓉娣和我在暑假中到他的辦公室去上導修課，為最後一年的課業做準備。日本佔領香港以後，大學就要關門了，是他向教學委員會提議所有最後一年的學生應獲頒「戰時學位」，所以在面對茫茫不可知，荒涼不可測的未來大海時，我們有了掙錢求生的浮板——資格證明。

在他離開學校與其他歐籍教職員一起被日本佔領軍拘留之前，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如果我有一紙推薦書在身，對我找工作會有幫助，所以他替我寫了一封。這個文件，我至今仍保存着；這個文件在我日後進入後方時十分有用。可是布朗教授戰後並沒有回到香港而是留在格拉斯哥。我在一九五四年任教新加坡馬來

亞大學到英國去進修時，曾與家人造訪恩師於格拉斯哥，再一次的表達了我深藏於心的感激。

還有兩位老師我一定要提的，即化學系的助教許惠嫻女士與鍾梁毅德太太。我是在中學時沒有讀過化學，而進入港大的學生，有這種情形的卻不多。因此在化學實驗工作上感覺特別困難。理論我可以學，而且可以勤來補拙，可是實驗的技巧初學者想在短時間內趕上卻委實不易。許女士與鍾太太兩位對我的情況都很了解，很同情，所以她們兩位都習慣在實驗課上不時停下來留意我的情況，看看我做得如何。此後不論什麼時候，只要我走過陸佑堂的底樓，也就是以前化學實驗室所在之處，總不免想起這兩位好心的女士。

許女士戰後留在大學，等到我一九七二年回來時她依然在化學系教書，這時已是高級講師了。我非常高興因為她長期的服務以及模範教師的表現而得到師生的尊敬與大學的認可：她一九八一年退休前夕獲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她退休之後還繼續在系裏服務，幾年以後，就在她離開香港到加拿大定居之前，將一筆相當大的款項捐給了母校港大。

我在港大念書時，所有的學生一律要住校，很少例外。我住的舍堂在般含道，是港大大學堂（今稱本部大樓）對面的聖約翰堂。聖約翰堂只有大約六十間房，我們每人一間。舍堂的生活，以我的眼光看來，真是相當舒適。我們的堂役將我們照顧得非常妥當，實際上可以說是縱慣。每個堂役大概管八個房間。他們將早餐送到我們的房間來，只要我們提出要求，茶、咖啡或其他的飲料就會送到會客室來。一天之內他們幾乎無時不在當值。他們打掃房間，清倒垃圾，還給我們擦皮鞋。生活得不是很像個王子嗎？

我在聖約翰堂結交了幾個真正的好朋友，司馬泰(Clifford Matthews)是我物理實驗課上的夥伴，他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開心的

人。其後，我們兩個好像隨時隨地都會碰到一起：在倫敦，我參加了他的婚禮，在牛津、在芝加哥、在香港也多次不期而遇。還有一位黃興宗，現在是在美國；一位張敏華，現在是在新加坡。這兩位幾十年來，我也總是不時相遇，把臂暢談。

聖約翰堂幾乎沒有可資大吹大擂的舍堂精神：每個人均是個人主義者。我記得我們舍堂的籃球隊與大學當時最強的舍堂球隊有一場比賽，整個聖約翰堂人在球賽中出現的只有六位，這六位包括了十人球隊中的四位，學生會的榮譽秘書，還有送飲料點心的堂役。舍堂裏竟沒有一個人來看球支持我們。但令人驚異的是我們居然勉力打出了十七比五十三的成績，我們四個的確是非常辛苦地打五個人的球，絲毫不敢放鬆，球賽結束時全都累垮了。我們的隊長楊裕德，是從泰國來的，功勞最大。他打得精采，而對方的隊長許昆崙更是打得漂亮，沒有比他表現得更令人驚嘆，更令人折服的了，戰後他和他的太太黃秀嫻都成了我要好的朋友。

聖約翰堂最突出的一點是：第一個組成交響樂團的舍堂，這樂團就叫做「聖約翰堂交響樂團」。我們在自己的舍堂，也在陸佑堂的許多場合表演過。我哥哥麗文與唐景端是第一小提琴手，我是第二小提琴手。我們表演的節目有莫札特的《小夜曲》，羅西尼的《雪爾維亞的理髮師序曲》；有《驚奇交響樂》中的幾個樂章，還有《第六號布蘭登堡協奏曲》。我們舍堂成立交響樂團在大學是空前的，而很長一段時間之內，我們的樂團也是唯一的，因為直到一九八二年，學校正式成立音樂系以後，才有樂團之設。

聖約翰堂有好些學生是從馬來亞來的，有好幾位來自富豪之家，在香港的日子過得太舒服了，都樂不思馬來亞了。當日的香港就像現在一樣，誘人之處實多。這些離家在外的年輕人要盡其所歡，又有誰能制止？雖然每晚九點半舍堂要點名，但對那些晚點名

後蓄意不聲不響地離開校園進城取樂的人來講，並不那麼困難。文學院的學生每年的考試不論失敗了多少次，都不會給踢出學校去。於是聖約翰堂有一位高年級的學生有辦法黏住他所喜愛的大學生活，一年又一年，做所謂的「職業學生」。他是個不錯的小夥子，又是傑出的足球員，我們足球隊的主將。我搬進舍堂還是青澀的任人欺負的新生時，他已經是三年級文科生中受人尊敬的「人上人」了。可是三年半後我以「戰時學位」畢業時，他依然是一個三年生。可憐的傢伙，連個戰時學位，也未能獲頒。

那些快樂的日子像夢似的很快就過去了，一覺夢醒，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我們聽見了飛機在啟德機場的上空盤旋，以及炸彈爆炸的聲音。最初我們還以為是英國皇家空軍在演習，但當我們看出來飛機翅膀上的標誌是紅色的太陽時，很快就意識到情況不妙；香港圍城開始了。雖然政府在無線電上，在報紙上再三告訴我們：香港在對外防禦上，已做足了準備。其實，反抗的可能與突圍的機會香港是一點都沒有的。政府這樣做，我想是為了防止群眾的恐慌。而我們香港居民，實際上是任何防禦都沒有，因為大部分的武裝軍隊已被徵召到歐洲為保衛英國本土而抵禦正在勝利當頭的納粹。香港只有海軍留下的兩艘護航艦，以及空軍的幾架教練機。至於地面部隊與可怕的日本皇軍相比，則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雖然日本侵略者在空中佔了絕大的優勢，對殖民地卻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害。對他們而言，這個地方已是他們自己的囊中之物，是一兩個禮拜之內就真正變成他們財產的地方。那又何必破壞？日軍入侵以後幾天，九龍陷落，他們的司令接管了極富盛名的半島酒店，以為總指揮部，對半島酒店則未動分毫。幾十年以後的一九七零年，我參加了一個由國際教育研究所舉辦的亞美教育家會議，住在半島酒店。我仍然找到了兩個半島的職員，他們當年在日人接收

半島酒店以後服侍過日本人，也從他們那裏聽到一些故事，很有意思。

九龍陷落以後，我與家裏的連繫完全斷絕了。然後就是港島圍城。為保衛香港而設置的成排大礮全衝着錯誤的方向。本以為敵人的攻擊會由前面的海上過來，結果他們是從背後的新界過來。建在山坡上的幾座礮，正面對着港口，而從背後一一遭擊，很快就全毀了。聖誕節當天，香港投降。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不久，黃興宗與我就被任命為空襲防衛毒氣官，由拜爾教授作一短期訓練，教導我們使用所提供的裝備來探測毒氣。等到聖約翰堂關閉時，空襲防衛隊就把我們安頓到大學山頂上、干德道五十三號、葉鼎新先生的家去。葉氏全家，也就是葉先生、葉太太、還有他們的三女一子對我們都非常好。女兒們都是港大的學生，是她們主動提出，由我們要求，而分配到他家去住的。我們非常感謝他們在戰爭期間供我們膳宿，更在香港投降以後，仍然給我們以庇護之所，讓我們在全香港的食物已成了奢侈品的時候，分享他們家辛苦貯存的食糧。可是我們實在不應該讓葉家長期這樣做，所以當我們一發現由大學舍堂改成的戰時醫院為無家可歸的學生提供飯食的時候，我們就改到那邊去吃飯了。這些完全失去了着落的學生當然也包括從馬來亞來的。戰時醫院可以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們早些時候儲存了大量的大米、鹹肉和黃豆。所以我們的伙食是米飯、鹹牛肉與煮黃豆，一天兩餐，一個星期七天，吃了好多日子。雖然伙食聽起來似乎又單調，又無味，但那總是食物啊，而且份量也相當夠。何況在那種生死未卜的時刻，誰還敢挑剔？這塊土地上有多少人在挨餓，我們實際上是很幸運的了。

戰爭期間所有的正常活動戛然中止，而這情況在香港投降以後仍然繼續，可以說百業停歇。滿街滿巷的小販，各種各類的叫賣，

不論什麼樣的小錢都要掙，以撐過當下的苦日子。大量的乞丐緊接着出現了，有些顯然是正在挨着餓的。看到這樣的人而又無法伸以援手，真是令人難受。但我們自己的情況實在並不比他們好多少。更令人痛楚的經驗是：我有時非走過某些街道不可，也就必須看日日夜夜躺在那裏的，同樣饑餓，可能還生着病的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們不再動彈了，然後有車來把他們的屍體運走。那些日子，所有的只是深沉的絕望。

在香港剛剛投降以後，有一段短時間，一般人仍然天真地以為盟軍很快就會來解救香港，但這樣的希望隨即就幻滅了。人們遂又覺得香港會有好長一段時間，也許是好幾年，為日軍所統治。這種想法大家確實是深信不移的，加上來自後方的廣播又不時鼓勵與敦促年輕人回歸祖國，於是有許多人開始計劃逃出香港去。

麗文與我是家中僅有的兩個壯丁，此外還有父親、妹妹、繼母、與繼母的兩個非常小的孩子。我們要離開香港，離開在這斷炊的困境中還要設法養家活口的父親，心下很是遲疑與不忍。可是，父親堅持我們離開，因為他認為我們如留在香港絕對沒有前途。他深具信心地說，靠了上帝的恩典，他一定可以安然度過。於是我們兄弟二人帶着沉重的心情，終於黯然離家而去。我們擔憂家人的安全與生計；也恐懼自己在奔向大後方的路程上橫亘着所可預見的險阻與不可逆料的艱難。